

況下，僅僅滿足於船隻修造和航行技術，或者從甲口岸到乙口岸再到丙口岸的事實陳述，常常是海洋史研究的誤區所在。本書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些問題，對「時間、空間和知識」三個維度有充份的關照，對群體和個人既有結構分層，也有個體情感、心態和自我意識的探討，足以示來者以軌則。

陳博翼

北京大學歷史系

**太田出、佐藤仁史編，《太湖流域社會の歴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東京：汲古書院，2007，32，354頁。**

日本明清史學界在江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的傳統由來已久。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使日本學者在中國進行田野考察再次成為可能。在諸多學術考察活動中，以濱島敦俊和森正夫等人對長江三角洲的實地考察最具影響力。濱島曾在長江三角洲的32個市、縣、鎮、村進行了多次訪談調查，對訪談調查和文獻資料進行了細緻分析，揭示出明清時期中國的民間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的組織，並有共同的活動領域。森正夫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市鎮進行了跨學科式的田野調查，深化了對明清以來地域社會變遷的認識。2004年8月以來，以太田出、佐藤仁史、稻田清一、吳滔、山本英史、陳來幸等中日學者為核心組成的「江南三角洲市鎮、農村調查班」，開始了對太湖流域長期的田野調查，並於2007年出版了《太湖流域社會の歴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以下簡稱《太湖流域社會》）一書。在實地考察中，這些學者有感於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劇，所見所聞均與傳統文獻中所描繪的「江南水鄉」景觀大異其趣。但隨着調查的深入，他們又發現，「值得慶幸的是，該地域現在仍然保留有足夠多的傳統農村的姿態」（頁5），這使廣泛收集傳統農村和水鄉古鎮的文獻史料，進而探討太湖流域農村社會史成為可能。通讀《太湖流域社會》全書，不難發現本書著者們始終着力於收集多層次多角度的地方文獻以及口述材料，從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綜合視角，對當今學界頗為關注的田野考察方法進行了理論反思，並回應了1980年代由日本學者森正夫提出的「地域社會論」。

本論文集編者認為，自森正夫提出「地域社會論」以來，研究者多以明清時代為討論的重點，忽略了清末民國的地域社會進程。即使有零星的相關討論，也大多偏向於近代城市史，對市鎮和鄉村社會往往不夠重視。有鑑於此，《太湖流域社會》一書秉持着「地域社會論」，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綜合公藏機構所藏的地方文獻以及實地調查材料，集中研究了該區域市鎮和鄉村在清末民國時期的劇烈變動。太田出在理解和反思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重視從鄉村統治、土地所有、商會、教育、漁民等視角出發，對其前輩森正夫、濱島敦俊等學者的學說加以繼承和發揚（頁8）。

《太湖流域社會》一書共分三部份，第一部份「地方文獻篇」由五篇論文組成。本書涉及的「地方文獻」具體來說主要指地方報紙、地方檔案、鄉土史料等。在收集、整理相關文獻之後，作者們嘗試從新發現的史料中選取與其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史料作重點介紹、分析和論證。其中山本英史的〈清末民國時期的鄉村職役實態與地方文獻〉一文，希望重現社會轉型期中國鄉村基層社會的實態。文章從地方志、地方報紙、地方碑刻等方面入手，研究清末民國時期鄉村基層社會管理中與徵稅和治安有關的「鄉村職役」，力求通過新開拓的史料復原這一歷史現象和過程。陳來幸則關注了民國至今盛澤鎮絲綢業的變遷。佐藤仁史從「教育圈」着眼，探討了福武直的「鄉鎮共同體」中有關江南地方基層社會的統合特質，期望能夠用「白描」的手法記敘近代教育在市鎮和農村的實際接受情況，從中反思清末民國時期市鎮社會的變動過程。太田出〈民國時期青浦縣老宅鎮社會與太湖流域漁民〉一文，與一般「地域社會論」的支持者大多把視野集中在農民或市民不同，此文將研究重點鎖定在以湖蕩等內陸水面為生產、生活的「場」的太湖漁民身上，揭示了與陸地生活經驗完全不同的「地域空間社會」的實態。稻田清一則以上海廣富林村為例，憑藉青浦檔案館收藏的該村詳細的地籍圖和地籍冊，結合實地考察和訪談，將田塊加以詳細的核對，重現了1940年代的土地所有關係。

本書的第二部份為「田野考察篇」，由三篇論文組成。編者認為，通過田野和採訪，能夠更有效地獲取被傳統文獻材料所忽略的「活」的歷史，只有將文獻史料與調查訪談相結合，才能實現真實的「歷史世界的構建」（頁186）。在數年的調查過程中，他們採訪了各行各業的人士，共計一百五十多位，包括圖正、保長、農民、漁民、宣卷藝人、佛娘等等。本書充份利用這些田野調查的成果，以之為基礎展開專題研究，特別突出了田野考察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太田仍然關注太湖漁民群體，在〈太湖流域漁民的「社」、「會」及其共同性——以吳江市漁業村的採訪記錄為線索〉一文中，依據太湖部份漁民組織「香頭」的採訪資料，研究了這些漁民信仰組織的歷史淵源、組織形式、運行情況及其與特定的神廟相聯繫的狀況，揭示出「社」不僅是因地緣而結合的基層組織，且更多地體現出血緣聯繫。他注意到，漁民的「社」的組織者——香客與香頭——共同建構了從蘇北遷入的祖先記憶。佐藤的〈從一宣卷藝人的活動看太湖流域農村與民間信仰——以上演記錄為基礎的分析〉一文，以一位宣卷藝人的演出記錄為基礎，考察了村落社會的人際網絡和信仰空間，並對近年來民俗文化的復興進行了反思。吳滔的〈莊家墟劉王廟與村落社會〉一文，嘗試用另一種方式解讀這些「口述材料」。他結合口述訪談與文獻資料，考察了社廟與村落組織的複雜關係。他在訪談中發現，儘管村民們的「歷史記憶」因為現實生活的需要而有了各自「合理化」的解釋，但卻為我們理解鄉土歷史的「真相」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方法。通過解讀口述材料的形成過程——即數村關於莊家墟廟及其廟會組織權的歸屬的不同版本的「故事」，可以追尋出歷史時期村落邊界劃定的細節以及各種社會網絡是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積累而成的。

要之，全書結合了豐富的檔案、文獻和口述材料，儘管各篇論文所用材料互有重疊，視角卻截然不同，其旨趣在於引發讀者從不同角度了解「太湖流域」作為一個特定「地域社會」的特質。基層社會鄉村職役的擔任者、太湖流域的漁民社會等話題成為他們關注的重點。這些話題的引出，既展現了廣闊的學術前景，同時也為進一步的討論留下了不少空間。

首先，本書雖以「太湖流域」作為其反思「地域社會論」的研究區域，但並沒有對這一複雜而多元的區域作更進一步的劃分，討論範疇往往根據作者研究的需要作任意的擴大或縮小。如太田出的兩篇文章討論的主題均是「太湖流域漁民社會」，前一篇發生在離太湖較遠的上海青浦縣，而後一篇則主要是在太湖中捕魚的漁民。雖然太田自己也發現在太湖中捕魚的漁民和在內河、水蕩的小水面捕魚的漁民存在着巨大差別，但他在行文中卻對兩者加以均質化的理解。如能將歷史現場獲取的口述材料落實到特定的時空中，無疑會使其分析更具說服力。其次，編者在前言中雖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清末民國時期，着力關注該時期「江南三角洲」市鎮和農村的實際狀況和社會變動，但或多或少存在着與大的社會背景和具體的歷史脈絡脫節的情形，使讀者難以從中獲得對整個江南社會結構變遷的整體印象。如山本英史關於「鄉村職役」的論文，揭示了傳統時期掌握基層土地情報、負責田地買賣證明、

催賦催糧乃至催租、溝通農村和官府的最基礎役職「圖正」的具體情況，重現了「鄉村役」的實際運作和現實場景，但是文獻材料中名目繁多的各色役職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指內容是否相同，中間是否存在制度運作的變化，他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追究。再次，本書的初衷是希望站在獲得更多的「地方文獻」和普通民眾的「真實記憶」的基礎之上，盡量用農民自身的話語去解釋近世江南的生活和變遷，但是對這些材料的利用方式卻沒能完全放到當時當地的話語系統中。如太田試圖將鎮上的「魚行」視為聯繫「水上人」和「陸上人」之間的紐帶，以回應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話題，即傳統時期國家是如何支配和掌握漁民的行為。但由於材料的限制，他對「魚行」的直接分析略顯單薄，未能清楚展現人群認同的「時空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水上人」、「陸上人」這兩個群體的區分，與其說是當地民眾的普遍理解，不如說是包括作者在內的「觀察者」的刻意行為。

總體說來，本書在問題意識上並未突破日本學界長期關注的「地域社會論」的學術脈絡。作為日本地域社會研究中堅的山田賢在1995年曾就「地域社會論」給予較全面的總結，提出將「地域」作為方法和視角，把地域從預設的空間範圍解放出來，將之視為由人際關係和人們的認知體系共同構成的複雜網絡。本書主要作者想必均贊成山田賢的主張，書中很多文章都注意到在地權、商業、賦役關係以外的人與人之間的網絡，但在探討這些各種各樣的網絡關係時，卻沒有深入特定的時間脈絡和空間脈絡，因此難以洞悉農村社會實際流變的過程。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書採取了日本學界慣用的長期考察、深入訪談的方式，但從書中節選的訪談記錄來看，對口述材料的處理稍顯刻板，尚未能在具體的語境和氛圍中解讀材料，因此難以深入理解受訪人的感受。

從根本上來說，《太湖流域社會》這一論文集只是「清末民國時期江南三角洲市鎮社會構造的變動和地方文獻相關的基礎研究」這一課題初期階段的成果之一，以整理和介紹調查資料為主。本書旨在向日本明清史學界介紹太湖流域相關專題資料的收集方法，以及田野調查的可行性，故列入「地方文獻情報篇」這一專題。由於本着這一初衷，書中所選八篇論文僅僅是對各自專題所用材料文獻做了梳理和交代的基礎上的初步研究，相信隨着材料整理和調查的進一步深化，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潘弘斐

中山大學歷史系